

【一般论文】

新加坡华人传统社群聚落的时空演变（1819-2000）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Settlements in Singapore (1819-2000)

倪伟伦*（上海复旦大学）

William N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williamwarm@foxmail.com

Published online: 28 DECEMBER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Ni, W. (2023). 新加坡华人传统社群聚落的时空演变（1819-2000）: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Settlements in Singapore (1819-2000).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4(2), 24-44.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4.2.2.202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4.2.2.2023>

摘要

本文利用19世纪初的档案地图资料以及部分史料，以新加坡华人会馆、方言社群等地缘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学视角梳理出新加坡从开埠时期到21世纪初，传统华人社群聚落的起源、类型特点、空间分布、时空演变的脉络；在对相关历史数据汇总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华人传统社群聚落空间变迁的驱动因素：早期新加坡多元移民社会特征与新华社会复杂的人口构成是华人传统社群聚落构建的催生力；英国殖民地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城镇规划手段是华人传统社群聚落诞生的推动力；而新加坡城市化进程则是华人传统社群聚落加快时空变迁的重要拉升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地理、聚落地理、医学史、海外华人移民史等。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开埠、社群、聚落、时空演变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archival map data and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takes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Singapore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dialect commun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we sort 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settlements in Singapore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e origin, type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composition is the catalytic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settlements; a series of town planning methods adopted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bir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settlements;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Singapore is the accele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change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settlements. Important lifting force.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opening period, community, settlemen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新加坡居于东南亚的中心，介于大洋洲和亚洲之间，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航运通道——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是连接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的海上枢纽，素有“远东十字路口”及“东方直布罗陀”之称。1819年，英国殖民者斯坦福·莱佛士登陆并建立起一个贸易据点，揭开了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的两个多世纪发展历程中，新加坡完成了由一个贸易港口到全球化城市国家的时空演变，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获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此过程中，人口占比高达75%以上的华人群体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研究从历史地理研究视角出发，即以新加坡华人社群聚落作为研究对象，以传统华人社群组织的起源、发展、变迁为核心线索，在挖掘大量档案文献、地图史料的基础上，分析港口资源、人口移民、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其历史空间变迁的作用，并以此来探讨全球化、多元文化环境影响下，历史聚落地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互动关系，揭示国家的治理模式和社会经济力量的推动对于城市地理变化及人文环境的深刻影响。

一、杰克逊规划与聚落空间的形成

1819年新加坡开埠初期，英国人采取自由港政策，以吸引周边人民移民新加坡进行开发，至1821年，人口数增加到5,000人，其中马来人有3,000人、华人1,000人、武吉人五百多人，其他为印度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欧洲人、欧亚混血人和其他土著。¹不久，莱佛士便开始着手设计这座城市，他将不同区域分别划分给华人、欧亚人、武吉人及马来人等居住，将他们分别安排住在不同的社区，华人集中住在大坡海边，由华人头目管理；岛的东端是武吉人居住，他们在梧槽河（Rochor River）口起落货物；马来人住在和瑞山（Bukit Ho Swee）一带河边。天猛公的村落在巴丝班让（Pasir Panjang），苏丹胡申的王宫则在小坡苏丹门（Sultan Gate）。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伊斯兰教徒居住在格南村（Kampong Glam）一带，该区域以南是欧洲人居住区；淡水河（Stamford Canal）的南岸是欧亚大商行的办事处和货栈；商业中心在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该地西边是唐人街，南边是淡米尔人的村落。²同时，莱佛士要求首任驻扎官威廉·法奎尔（William Farquhar）建设一道桥，沟通了新加坡河两岸的人民活动。此外，他还命令工人将河边的沼泽地填平，也就是今日的驳船码头（Boat Quay）莱佛士坊和附近一带。在他离开新加坡之前，他写信给法奎尔，就

¹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Kuala Lumpu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4.

² G.P. Dartford 著, 许云樵译, 《马来亚史略》, (新加坡: 联营出版社, 1959), 页 122。

殖民地的具体开发方式给出了相关指示。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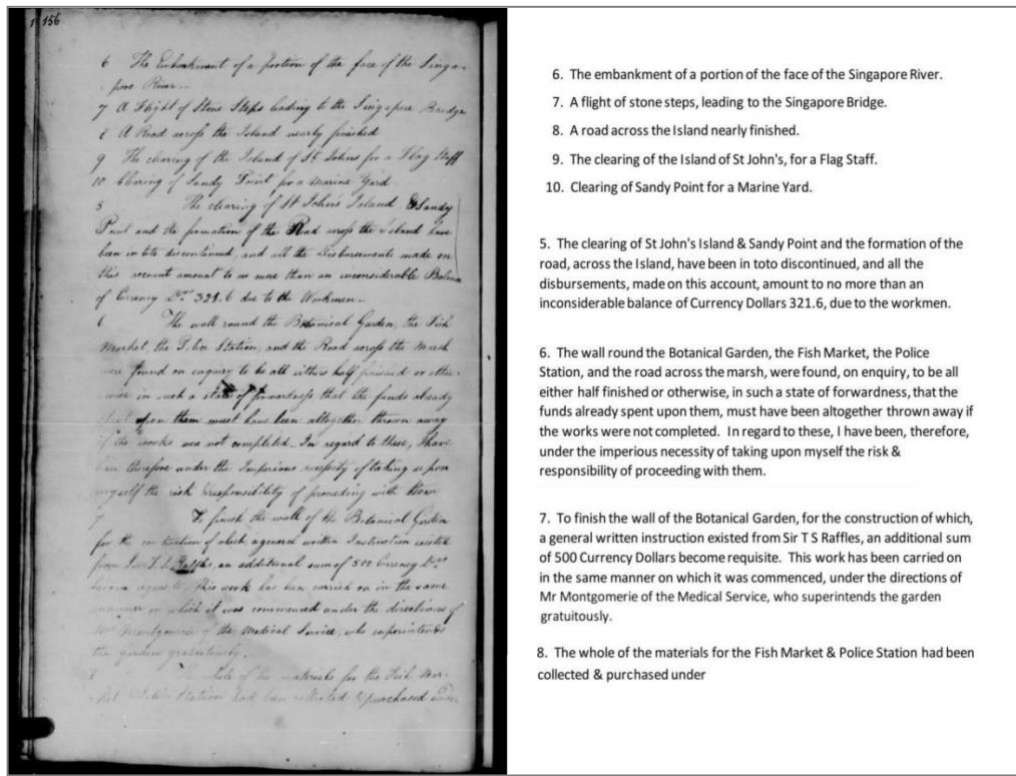


图 1 莱佛士写给威廉·法奎尔的书信原件及说明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L19: Raffles: Letters to Singapore (Farquhar) Page 180 of 378.

1819 年至 1823 年，法奎尔统治新加坡期间，由于资金有限，他选择了一种较务实的开发方式，1822 年，进出新加坡港口的船舶达到十三万零六百八十九吨，货运价值高达八百五十万西班牙银元，贸易增长远远超出了莱佛士所期望的最高额，但是码头与港口装卸的设备却没有更新。1822 年 10 月，当莱佛士最后一次回到殖民地时，他觉得法奎尔没有严格遵守他的指示而造成混乱的城镇规划与建设：例如，法奎尔允许商人侵占指定的政府区域，他甚至允许巴东河和附近的新加坡河两岸被建造房屋和仓库，而这些都是莱佛士规定的不得被个人永久占用的区域内。⁴

莱佛士于 1822 年 10 月 17 日设立土地分配委员会（Land Allotment Committee），成员包括：沃利奇博士（Dr. Wallich）、拉姆斯坦博士（Dr.

³ Charles Burton Buckley,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1902 (limited), pp. 56-58.

⁴ 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p. 38.

Lumsdaine) 和萨蒙上尉 (Captain Salmond) 三人。他们的任务是重新划定新加坡市区地段。接着, 在十月的下旬, 莱佛士委命了彭汉 (S.G. Bonham)、庄士顿 (A.C. Johnston) 与戴维斯上尉 (Captain Charles Edward Davis)、组成“城市开发委员会” (Town Committee), 后者担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也包括了阿拉伯人、马来人、武吉斯人、爪哇人以及华人各一名代表。同时他们也得到了菲利普·杰克逊中尉的协助, 杰克逊按照莱佛士的指示具体制定了该地区的布局图。

莱佛士又于 1822 年 11 月 4 日向委员会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其中的一些重要指示如下:⁵

- (1) 旧线(在莱佛士时代仍可看见的新加坡古城墙, 大约是斯坦福路现在所在的地方)与新加坡河之间的区域, 包括旧线以东 200 码处(即布拉斯巴沙路现在所在的地方)之间的区域, 将保留给政府使用。
- (2) 欧洲人居住区将位于营地以东(政府地区), 直到苏丹的土地。环道与泰罗克艾尔湾之间的海域和西南面的屯驻区将提供给欧洲及其他商户使用。
- (3) 莱佛士预计, 华人将形成最大的社区, 因此, 新加坡河西南方的一大片地区被保留给华人使用, 但商业用途的地区除外, 印度人将在河上游定居。
- (4) 武吉斯人(他们已经在 Kampong Glam 定居, 直到 Rochor 河河口)和阿拉伯人将被分配到苏丹土地旁边的地区。莱佛士不相信还会有大量的马来移民来, 但他认为他们可以定居在河的上游, 小海湾和入口处。
- (5) 海边将保留作公共用途。
- (6) 除了分配土地外, 莱佛士还提出了其他建议, 例如市场应该迁往哪里(指 Telok Ayer 市场), 墓地应该在离城镇较远一段距离的地方。莱佛士还规定, 街道和建筑物应以统一和定期的方式排列, 例如街道应有最小宽度和直角相交, 每条街道上应有确切的房屋数目。他的建议还具体包括建筑物的材料和特点。莱佛士的指示都被纳入了该计划, 尽管并非所有这些要求最终都得到了执行。委员会就将居民安置到各自地区的建议, 征求了马来人、华人、武吉斯人、爪哇人和阿拉伯人社区代表的意见。⁶

⁵ Charles Burton Buckley,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pp. 81-86.

⁶ “Raffles Town Plan/Jackson Plan is Initiated”. History SG. National Library 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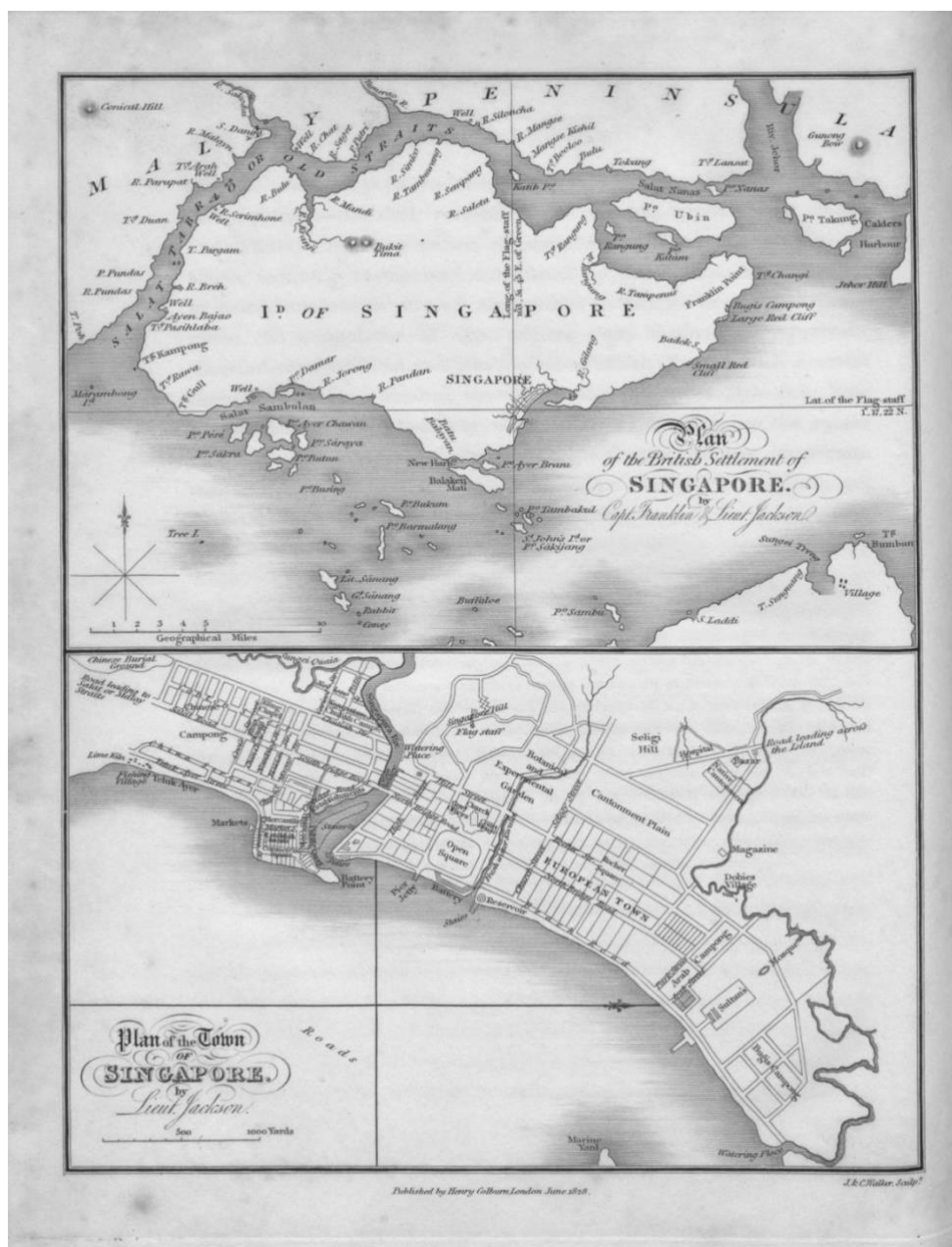


图 2 新加坡城镇规划图（1828 年）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编号：GM000014

Title:(a) Plan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Singapore By Captain Franklin And Lieut. Jackson (b) 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 By Lieut. Jackson.

杰克逊规划的理念充分体现了莱佛士个人理想主义与政治需求，莱佛士从他曾经去过的殖民城镇（例如马来西亚檳城的乔治城）汲取教训，制定了这套城镇规划。在乔治城，印度和中国移民的聚落被纳入到正式的城镇规划中；莱佛士还借鉴了加尔各答等印度殖民城镇的常见特征，用一座堡垒作为著城镇的中心。于

是，新加坡的福康宁山（在规划中被标记为“新加坡山”）也就自然成为莱佛士选择的政府所在地。为了给人以心旷神怡的印象，莱佛士还强调种植绿色植物，通过公园和花园的建设，增加了城镇绿色景观空间的塑造。⁷

1819年至1930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殖民地政府对于新加坡城市空间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莱佛士制定了关于自由贸易港一系列的免税政策，新加坡河发达的港口商业模式也随之被塑造起来，吸引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等各个族群的移民在此聚居，促进了新加坡最早的城市发展。殖民统治者积极开发新加坡港口，使其成为可停靠大型船只的重要船舶基地，同时引入当时欧洲理想城市作为城市化建设原型，开始着手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在新加坡河的两岸规划市镇，开发网格状的街道交通系统；在土地的分区管理上，实施种族社区隔离政策，华人居住区被规划于河的南岸，印度人及马来人居住区被规划于北岸地区，欧洲人的住宅则远离繁杂的码头，坐落于市郊的小丘上，呈现出都市空间层级的差异；政府也在河两岸的地块兴建商业、海关建筑与公共设施，包括巨大的城市广场、草坪与公园等；新加坡河沿岸被兴建了大量的商业与仓储建筑，形成店屋空间与不同族群居住的社区空间。特别是牛车水中国城（China Town）作为典型的华人市镇聚落被规划出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区的早期华人移民根据方言、地缘、血缘、业缘等特点，组建了各自不同的街道聚落空间，新加坡河两岸密集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会馆，成为重要的华人社群聚落空间。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加坡贸易出口量激增，经济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为城市建设的黄金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扩张时期，新加坡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繁荣之城”（Boom Town），1926年的市政厅、1928年的邮局、1937年的高等法院等一批重要的建筑均完成于此时期，至今仍矗立于新加坡河岸，成为历史保留建筑。

二、新加坡河口规划与华人社群聚落的诞生

（一）新加坡河口的开发

新加坡开埠后能够发展成为重要的港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的深水港息息相关。19世纪中叶，新加坡已是欧亚海运交通枢纽，作为英国远东亚太地区的贸易站，新加坡河口自然成为了路经船只停靠的港口。新加坡河大致分为三个

⁷ Lim, J.(n.d), Town and country. The Straits Times (1991, March 20), p. 2.

主要的河段，沿岸修建了驳船码头（Boat Quay）、克拉码头（Clarke Quay）和罗拔申码头（Robertson Quay）。驳船码头建在新加坡河口一处弯曲地带，位处新加坡河河南岸边，靠近粤海清庙、海唇福德祠、应和公司，帆船可以直接停泊在新加坡河口岸边。为了发展商业，莱佛士将现在莱佛士坊一带的小山铲平，并将沙土填在河岸边。铲平的地区被开辟为商业区，河岸边填土的地方修建起了码头，这大概是新加坡最早的城市规划和发展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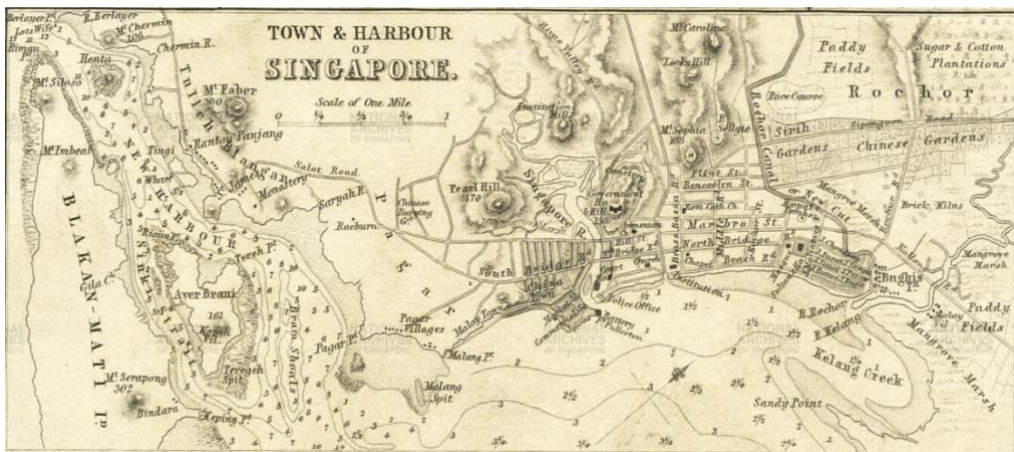


图3 新加坡港口与城镇地图（1864年）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编号 D2018_000172_RGS

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建成后，新加坡河岸两边都被开发出来，连接河内流的克拉码头岸边及周边林立的骑楼式建筑多为商铺及货仓，成为东南亚最繁忙的舢板船区域贸易集散码头。由于新加坡的驳船业船只数量较多，使用种类繁多，分工极为细致。因此，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移民开始盘踞在河口一带，一部分人从事载运船员、修船工人、船务代理员等行业谋生；还有一部分华人移民为码头货运劳工（又称估俚、苦力，coolies）。不同华人社群的地盘逐渐被区隔开，在近一个世纪的移民和发展过程中，新加坡的华人纷纷建立了以方言区为划分标准的“帮”，兴建庙宇，并逐渐形成包括以血缘、地缘及业缘为基础的宗亲、宗乡社团在内的华族会馆。如1870年代，已为数不少的金门人侨居新加坡。其中，一部分的商人于1876年正式建立“浯江孚济庙”（金门会馆前身），一部分的劳工则在新加坡河沿岸成立至少34个乡团，并合组“金浯江”（浯江公会前身）⁸。

⁸ 江柏炜，《新加坡的出洋客》，（台湾：金门县文化局，2011）。

早期华人影响力最大的祠庙一般都位于新加坡码头与河口，主要是为了庇护来往的船只与中国南来的移民平安到港。如牛车水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庙里祀奉的是天后，以保社稷平安。天福宫不但是福帮的庙宇，也是当时他们活动的大本营。早年财雄势大的福建会馆也设在庙里；座落在直落亚逸街的海唇福德祠是新加坡最早的寺庙之一，由广、客两帮人士在 1820 年左右所建立。庙内所奉祀的主神是大伯公。1850 年建竣的粤海清庙早期只是一座亚答屋，它虽然是潮州人的庙宇，也是潮籍人士的会馆，位于城镇中心的菲利普街（Philip Street）。

与此同时，由于华人南来登陆后，基本上都选择在码头周边谋生，因此临近新加坡港口的牛车水唐人街很快成为早期华人会馆的集中区。新加坡的第一个华人地缘性组织是 1822 年在牛车水成立的宁阳会馆（台山籍人士的会馆），崇祀妈祖。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 Road)，因其华人的社团和会馆林立，故有会馆街之称。短短一条街，各种会馆和社团一字排开，密密麻麻，令人眼花缭乱。以姓氏为主的计有余氏总会、福建济阳蔡氏公冢、颜氏公会、广肇胡氏联谊会、高氏公会、梁氏总会、魏氏公会、邓氏总会和谢氏总会等。还有晋江会馆、潮安会令馆、顺德会馆、李庆盛堂、厦门公会等同乡组织。以行业为主的社团有中药进出口商会、食品厂商公会、干海产进出口商公会、英和商务公局等。⁹

（二） 华人传统社群聚落的特点

近代新加坡华人社团众多，其中传统的地缘、业缘、血缘、三大组织在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谓地缘性的组织，乃指各以省、府、县、乡或村为单位的组织。大规模的组织都称为会馆，如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琼州会馆，潮州八邑会馆，永春会馆，宁阳会馆，应和会馆，三江会馆等。同乡会是较小规模的地缘性组织，如福州关峯同乡会，玉屿同乡会，古宁同乡会，重兴同乡会等。地缘性会馆这类组织，最初设立的动机乃在为各邑籍人士之个别共同利益，比如救济失业，协助病贫者，资助无资归乡者，或帮助调解纠纷的事务，继而购置义山，兴办教育，举办慈善公益事业。¹⁰光绪五年《新建番禺会馆碑记》记载：“尝思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此百姓亲睦之道也。因推此义，以期相友相助，而建此会馆焉。”¹¹又如《重建应和馆碑》记载：“盖开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兹我梅州应和馆，立于嗜地。屋建三

⁹ 沈立新，《新加坡牛车水的历史变迁》，（《八桂侨史》1992年，第3期）（总第15期），页49。

¹⁰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页22。

¹¹ 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页205。

重，既羨神灵得所，当日谋胜于在斯，本馆于道光叁年，经营创建……”¹²。

表 1 新加坡主要华人地缘性会馆简表（1819—1965 年）

名称	方言	原籍	创立时间	名称	方言	原籍	创立时间
宁阳会馆	广州	广东台山	1822	温州会馆	吴语	浙江温州	1923
应和会馆	客家	广东嘉应州	1823	惠安会馆	闽南	福建惠安	1923
中山会馆	广州	广东中山	1838	清远会馆	广州	广东清远	1925
福建会馆	福建	福建	1839	四会会馆	广州	广东四会	1925
南顺会馆	广州	广东南海、 顺德	1839	潮阳会馆	潮汕	广东潮汕	1925
冈州会馆	广州	广东新会	1843	南安会馆	闽南	福建南安	1926
义安公司	潮州	广东潮州	1845	南洋客属总会	客家	嘉应、永定	1929
琼州会馆	海南	海南	1857	潮州八邑会馆	潮汕	广东潮州	1929
茶阳会馆	客家	广东大埔	1857	漳州会馆	闽南	福建漳州	1929
永春会馆	福建	福建永春	1867	同安会馆	闽南	福建同安	1931
丰顺会馆	客家	广东丰顺	1873	高明同乡会	广州	广东高明	1936
惠州会馆	客家	广东惠州	187 ?	南洋华北同乡会	华北	华北	1936
金门会馆	福建	福建金门	1876	潮安联谊社	潮汕	广东潮安	1937
东安会馆	广州	广东东莞、 宝安	1876	广东会馆	广东	广东	1937
番禺会馆	广州	广东番禺	1879	龙岩会馆	客家	福建龙岩	1938
肇庆会馆	广州	广东肇庆	1879	南洋东山会馆	闽南	福建东山	1938
三和	客家	高州、廉	1883	南洋普宁会	潮汕	广东普宁	1938

¹² 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页 171。

会馆		州、广西省		馆			
三水会馆	广州	广东三水	1887	鹤山会馆	广州	广东鹤山	1939
三江会馆	吴赣	江西、浙江、江苏	1908	揭阳会馆	潮汕	广东揭阳	1941
福州会馆	福州	福建福州	1909	高要会馆	广州	广东高要	1941
福清会馆	福州	福建福清	1910	两湖会馆	湘鄂	湖南湖北	1947
永定会馆	客家	福建永定	1917	增龙会馆	广州	广东增城	1947
晋江会馆	闽南	福建晋江	1918	恩平同乡会	广州	广东恩平	1948
兴安会馆	莆田	福建兴化	1920	古宁同乡会	闽南	福建金门	1951
安溪会馆	闽南	福建安溪	1923	潮安会馆	潮汕	广东潮安	1964

资料来源：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 1-3 册 整理；参考：徐慕君，吴巍巍，《近代新加坡华人社团探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 31 卷 第 6 期，2014 年 12 月）。

业缘性组织指从事各个行业人士所组织的工商行会。19 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移民遍布各行各业，据 1948 年劳工部的报告书所载，各籍华人的职业如下：闽南人——树胶园，装卸货，驳船，采石，烧砖，木匠，泥水匠，黄梨业，火锯及搬运夫；广府人——机器，木匠，园丘场工，打金及制革；潮汕人——制鞋，渔夫，藤器，火锯及驳船；客家人——制鞋，藤器及洋铁用具；琼州人——树胶工，面包，咖啡，饼干，海员及室内服务；宁波、温州、江西及上海人——家具，帷帘椅垫，装修及革制品；兴化、福州、福清人——酱油，海员，修理脚踏车及车胎翻新。¹³

方言群对于行业的垄断，决定了许多华侨业缘性组织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使早期的华人社会帮派林立，纷争不断。1906 年，新加坡成立的“中华总商会”就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所有会馆和其他社团组织中最重要组织之一。同时它也是作为团结华商、保护华商而成立起来的华商的总机构，由华人社会各帮代表组成，除维护华商利益，促进经贸发展外，还要调解各帮派间的矛盾与纠纷，代表华人社会向政府交涉不利华人的法令或政策。

¹³ 新加坡《南洋年鉴》，1951 年，页 155。

表 2 新加坡主要华人业缘性组织简表（1819—1965 年）

名称	行业	创立时间	名称	行业	创立时间
梨园堂	演艺	1857	中医中药联合会	医药	1929
北城行	建筑	1868	商车公会	汽车脚车	1932
姑苏行	酒楼	1876	五金机械公会	机械	1935
轩辕洋服商会	服装	1880	印务同业公会	印刷	1937
鲁北行	建筑	1890	家私商公会	家私	1937
中华总商会		1906	华人金银商业公会	金银	1939
布行商务局		1908	华洋百货公会	百货	1940
星洲杂货行	粮食杂货	1908	华人饭商公会	酒楼	1940
华商货市公所	百货	1911	新加坡派报同业公会	派报	1940
福州木帮公会	木匠	1912	中药进出口商公会	医药	1946
树胶公会		1918	面包西果公会	面包	1947
当商公会	当业	1920	华人鞋业商会	制鞋	1951
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	咖啡	1920	瓷商公会	陶瓷	1951
海屿郊公所		1920	汽车胶轮商会	汽车胶轮	1952
欧美什货食品商务局	什货	1928	自由车商会	汽车零件	1952
汽油口业公会	汽油	1928	米糖京果批发商联全会	米糖京果	1958
钟表业公会	钟表	1929	新加坡艺人公会	演艺	1964
华人机械公会	机械	1929	铜铁行公会	铜铁	1965

资料来源：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 1-3 册整理；参考：徐慕君，吴巍巍《近代新加坡华人社团探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第 31 卷第 6 期 2014 年 12 月）。

所谓血缘性的宗亲组织，乃是指氏族宗亲的团体。在早期，华人移民梯山航海，远涉重洋，移居星岛，他们来自中国各省各乡，为了联络某一姓氏宗人，于是便有姓氏组织的产生。宗族的组织类似中国的宗祠，它乃基于华族的伦常观念，

创立的宗旨为联络宗亲的感情，解决宗人的纷争，协助宗人解除贫穷，疾病及失业之难题以及祭祖等。¹⁴

例如，林氏大宗祠九龙堂集合林氏跨越方言群的宗族力量，被视为星洲林氏的最高机构。主入口两侧墙上的大理石碑记录着其起源，右侧碑记题为《始建新嘉坡九龙堂记》，落款为“裔孙云龙谨识、裔孙子英敬书”¹⁵，时间是“中华民国十七年岁次戊辰腊月吉旦”（1929年1月或2月）。左侧碑记题为《新嘉坡新建九龙堂诸宗亲芳名捐款开列于后》，落款是“正总理志义、副总理国和、副总理水枘”与12位董事，时间是“中华民国拾捌年岁次己巳十月”（1929年11月）。伴随着先民南来，林氏源流文化移植到星洲，以血缘关系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网络，为宗族谋取利益，九龙堂洋式建筑的外表下保留着千年华魂，供奉神主牌，延续祭祀文化，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重要表述。

表3 新加坡主要华人宗亲会馆简表（1819—1965年）

名称	姓氏	原籍	创立时间	名称	姓氏	原籍	创立时间
曹家馆	曹	广东台山	1819	云氏公会	云		1936
四邑陈氏会馆	陈	广东江门 四邑 开平、恩平	1848	太原王氏公会	王		1937
台山黄家馆	黄	广东台山	1854	颍川公所	陈胡 姚虞 袁田		1937
福建九龙堂	林	福建	1857	琼侨邢氏公会	邢	海南	1939
濂溪别墅周家祠	周	广州、肇庆	1861	张氏总会	张		1939
凤廓汾阳公司	郭	广东潮州	1865	南洋沈氏公会	沈		1940
古城会馆	刘关 张赵		1866	潮州弘农杨氏公会	杨	潮州	1941
潮州江夏堂	黄	广东潮州	1866	汾阳公会	郭		1941
李氏书室	李	广州惠州	1874	开闽王氏总	王	福建	1945

¹⁴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页13。

¹⁵ 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页278。

		肇庆		会			
保赤宫陈氏宗祠	陈	福建	1878	邓氏总会	邓		1945
潮州西河公司	林	广东潮州	1879	卓岐王氏同乡会	王	福建	1946
符氏社	符	海南	1887	曾邱公会	曾邱		1947
潮州陇西公会	李	广东潮州	1890	南洋詹氏公会	詹	海南	1947
韩氏祠	韩	海南	1900	广惠肇许氏公会	许	广东	1947
龙氏公会	龙	海南	1903	南洋谢氏总	谢		1948
陇西李氏总会	李		1907	蓝氏总会	蓝		1949
平阳汪氏公会	汪	福建同安	1908	星洲梁氏总会	梁		1950
琼崖黄氏公会	黄	海南	1910	南洋黄氏总会	黄		1951
荣阳堂郑氏公会	郑		1921	南洋范氏总会	范		1952
琼州梁氏公会	梁	海南	1924	南洋周氏总会	周		1954
琼崖王氏祠	王	海南	1926	南洋唐氏宗会	唐		1955
延陵联合会	吴	福建泉州	1928	姚氏公会	姚		1956
苏氏公会	苏	福建	1929	南洋赵氏总会	赵		1956
南洋赖氏公会	赖		1933	庄严宗亲会	庄严	海南	1963
琼崖陈氏	陈	海南	1935	南洋程氏总	程		1963

资料来源：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3册整理；参考：徐慕君，吴巍巍《近代新加坡华人社团探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第31卷第6期 2014年12月）。

三、华人方言群聚落的空间分布

19世纪的较早期，新加坡牛车水一带已呈现华人方言群分类而居的情形，这种人群分类现象在空间尺度上甚至缩小至一条街道，如福建街、厦门街、直落亚逸街多为福建人聚集的地方；潮州人主要分布于菲利普街、沙球劳路等；史密斯街、马交街、香港街多为广府人分布地；客家人则聚集于克罗士街、北京街北

侧、南京街等地。华人族群依照语言的分类标准聚集而居，以街、街区作为聚居单位，并设有人群自属的信仰中心作为聚落社会空间，这样的居住现象基本上再现了原乡特有的，以庙宇结合人群的传统聚落组织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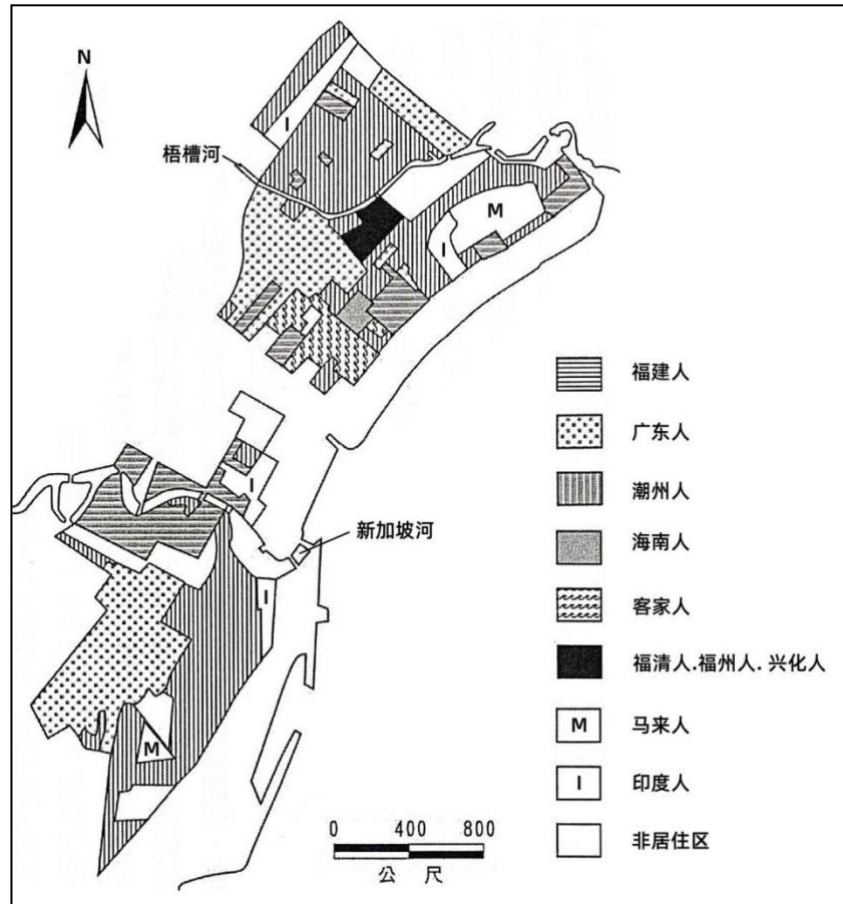


图4 华人方言群聚落分布图（19世纪）

绘图资料参考：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1.

由于华人方言群聚落经常会流动、相互替代，边界也不是那么明确，主要原因是与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社群互动有关。因此，牛车水市镇方言群聚落应属于人口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优势社群，而非如华南原乡的单姓村聚落形态或檳城五大姓公司的高度集居、城市姓氏聚落的状态。

麦留芳曾以 1891 年及 1901 年的新加坡的人口普查资料、街道名称、行业及业缘社群建筑物来重建福建、广东、潮州、客家方言群聚居，大致上发现建立方言群会馆的所在街道或社区多半是该方言群的优势空间领域；如果有些街道有超过一个以上的方言群，至少有两种解释，其一为各方言群曾在不同时代先后聚居

于此，其二为各方言群可能同时聚居于不同段落的街道。不论自愿与否，华人移民都经过语言的过滤过程而聚居在一起，由于行业、语言、会党组织的共同运作的结果，导致了各经济性质相异的乡镇吸引了不同的地缘社群。¹⁶因而，在聚落空间上出现某一方言群与行业特别集中分布的趋势：大致上，福建人多从事商业及贸易活动；潮州人是出入口商及甘蔗园、甘蜜及胡椒种植的劳工；广东人以工艺技工为主；客家人多经营打铁店与药材店，此外也涉及布匹业，大坡大马路、小坡爪亚街一带客人创设的布匹店林立¹⁷；海南人从事家庭帮佣及开设咖啡店。这种现象结合聚族而居的城市空间，亦反映于街道的命名，如福建街、广东街、潮州街、海南街、厦门街、当店巷、打街、衣箱街、碗店口、菜市街等。在这样的帮群结构之下，散布于牛车水各条街道的各个华人聚落不仅是一个自我认同、紧密联系的小型社会，更是自我划界、排外的地方社群活动空间。

此外，由于莱佛士观察到华人社会的帮派特性，故特别强调不同方言群应分区居住，避免纠纷。同时，由于习惯与同一方言的社群聚族而居，华人聚落逐渐产生公共空间的需求，如会所、祠庙、会馆等社会空间形态。这些设施形成之后，更进一步吸引新旧乡侨的再次融合，从而诞生出更大的社群组织，并逐步扩大其聚落空间领域。

四、华人社群聚落空间的变迁

1860年代开始，新加坡河成为了贸易港口，船只登陆频繁，很多人来此开展业务并建造仓库，整个新加坡近75%的船只活动都在新加坡河上进行。但随着商业贸易的成功，河流遭受了污染，工厂、生活污水都被倾倒入河流中。进入20世纪50年代，现代交通的发展使得航运和城市发展的相关性逐渐减弱，但是城市开发对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则提出新的要求。从20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清理河道，需要规划有效的排污系统把污水分流出去，同时清洁、修复河岸。当时很多商业、工厂被迫搬走，整个区域需要重新开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河岸边的不少华人会馆也逐渐从市区向全岛其他区域搬迁。从1960到80年代，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城市重建局（URA），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思维下，以清除贫民窟与改善实质环境为主。政府为了大量发展组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拆除老街道与旧设施，同时对牛车水历史文化保留区

¹⁶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页95-116。

¹⁷ 《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页435-442。

提出了新的整体规划，旨在充分利用周边丰富的历史建筑和风貌，为新加坡河滨水区重新注入活力，打造一个新的商业和旅游文化走廊。

表 4 1819—1973 年期间新加坡华人会馆注册登记统计表

会馆类型								
成立时间	地缘会馆		血缘会馆		业缘会馆		总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819-1890	18	13.5	14	7	5	2.9	37	7.3
1891-1941	64	48.1	60	30	66	37.7	190	37.4
1945-1959	45	33.8	93	46.5	55	31.4	193	38
1960-1973	6	4.5	33	16.5	49	28	88	17.3
总计	133	100	200	100	175	100	508	100

Sources: Ngow ,1975,Vol I:194-198;Vol II:213-219;1977,Vol III:168-173.
Republic of Singapore,Government Gazette,vol.xvI no.45 June 25,1976.
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āng Structu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p.39.

通过表 4 可以分析出，从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华人会馆的发展走过了一段成长期；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60 年代，会馆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却开始逐渐走向衰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业缘会馆的发展属于特例。这是由于 1965 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各个行业的迅速扩张，现代商业网络的资源更加需要优化整合，因此行业之间的互通合作变得尤为重要，业缘会馆的设立对于经济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社会中的方言、血缘为纽带而组成的抱团取暖方式正逐步被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开放、包容方式所淘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以地缘与血缘作为门槛的会馆面对会员老化和后继无人的危机。日渐成长的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多受英文教育，缺乏乡土观念，对会馆活动不感兴趣。

1965 年新加坡独立，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多元文化与多元种族的民主国家，大力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帮群及族群意识也自然而然相对地淡化了。政府设立各种部门负责国民的教育、社会福利、就业、医药及住屋问题，同时也设立了人民协会和民众联络所为民众提供休闲活动，以及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的桥

梁。因此，这些措施大大地削弱了宗乡会馆的社会与教育功能。1984年12月2日，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广东会馆、琼州(今海南)会馆、福州会馆、三江会馆、晋江会馆及惠安会馆联办“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探讨会馆如何在新的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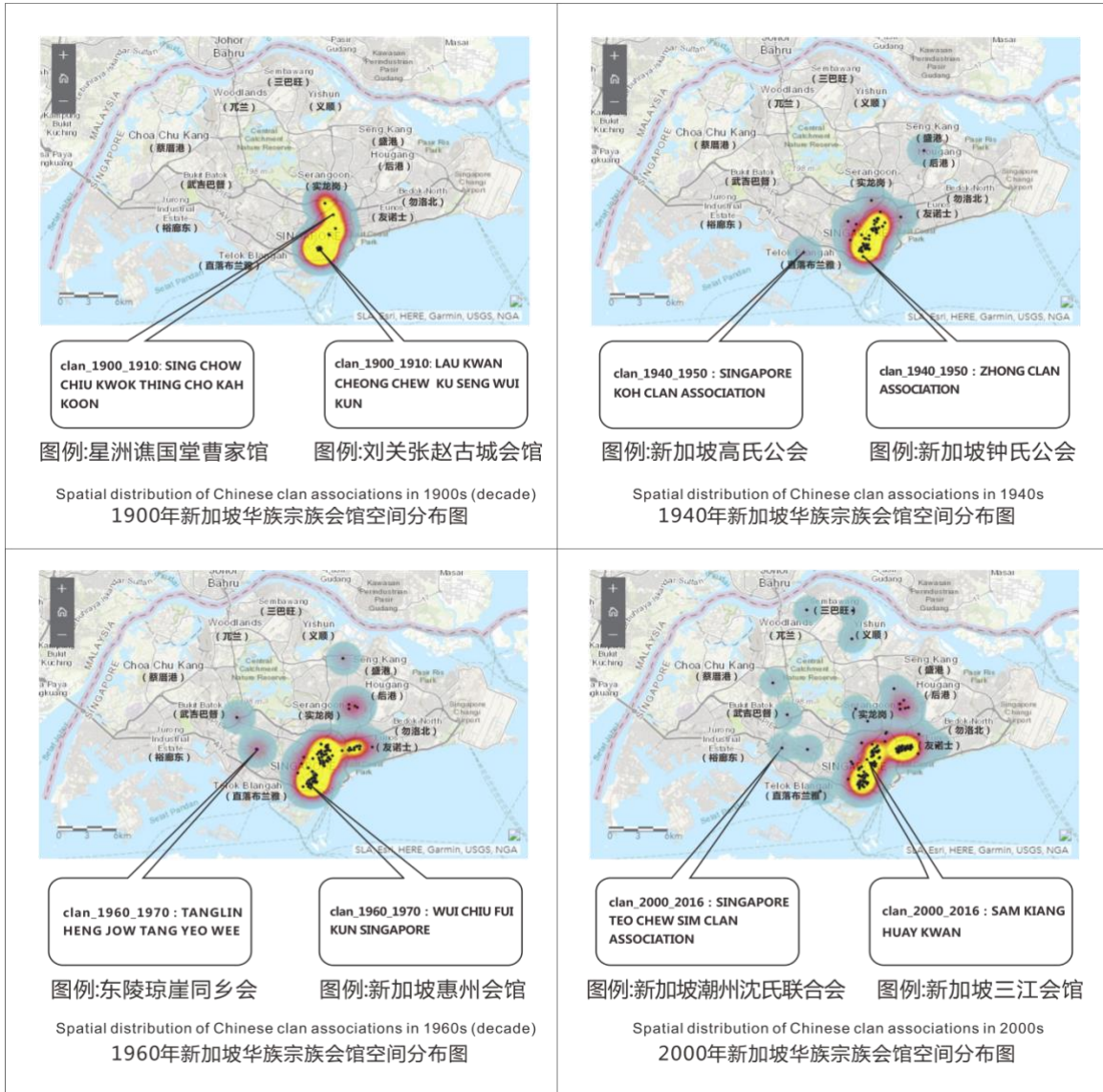


图5 1900—2000年新加坡华族宗族会馆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Singapore Historical GIS Website: <https://shgis.nus.edu.sg/>

有关空间分布对比，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的GIS研究的数据分析，早期的华

¹⁸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页107。

人血缘会馆起源于华人市镇，集中在牛车水和新加坡河口一带，1960 年代左右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并逐步向市镇外围扩张。从 1960 年到 2000 年的后续 40 年中，血缘会馆数量的增长缓慢，同时继续向城市以外的区域拓展。造成这样的时空变迁的原因与新加坡 1960 年之后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动有直接关联。

五、结语

由于早期莱佛士的市区发展计划将各方言群分区居住，如广帮聚居在牛车水（Kreta Ayer）、福建帮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 Street）、潮州帮集中在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一带等，乡土籍贯观念催生了各方言群的自我认同，而移民社会内部结社自保的动力，促使同乡成立地缘及方言缘的同乡会如地缘的会馆、血缘的宗亲会、业缘的行会、秘密会社甚至义山等华人早期的社群聚落组织，最终导致一个称为“帮”的方言社群网络的形成。五大方言群：福建、潮州、广府、海南和客家组成了新华社会帮权结构的主要部分，地缘与方言缘自然成为华社帮权组织结构中内部的区分界限。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新加坡逐步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新城镇开发、城市更新、工业化，以及公共住房的不断升级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人口的大量迁移。华人传统社群聚落的空间因此也伴随着人口的向外流动不断演绎着时空演变：血缘与地缘组织逐渐衰退，业缘组织在城市扩张的影响下逐步向城市外围变迁。

【征引文献】

一、论著

江柏炜，《新加坡的出洋客》，台湾：金门县文化局，2011。

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G.P.Dartford 著、许云樵译，《马来亚史略》，新加坡：联营出版社，1959。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77.

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Charles Burton Buckley,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1902(limited).

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āng Structu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二、档案馆资料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编号：D2018_000172_RGS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编号：GM000014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L19: *Raffles: Letters to Singapore (Farquhar)* Page 180 of 378.

"*Raffles Town Plan/Jackson Plan is Initiated*". History SG. National Library Board.

三、其他

沈立新，《新加坡牛车水的历史变迁》，《八桂侨史》1992年，第3期(总第15期)。

新加坡《南洋年鉴》1951年。

《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Lim, J. (n.d) (1991, March 20). Town and country. *The Straits Times*.